民国以来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批评始终不绝，对中国持乐观态度者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发展过于缓慢，持极端悲观态度者则要否定“科学”在中国古代的存在，不过是只有“技术”而无“科学”。种种对中国的科学史的非议，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以西方作比较，则清代以后的中国，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，触目惊心，难怪要生出从根子上的自卑之感。但要彻底地进行否定，还是属于偏激的后见之明。对历史事实进行全称否定，要远远比做出特称肯定，来得困难。要真正“认识你自己”还有许多路要走。

李·约瑟在本书的序言写道，其工作也只是得到了某些初步的成绩，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探讨。直到现在，本书所想要探讨的问题仍旧没有更富见解的后来者，这一课题的困难、复杂程度可见一斑。按理说文化身份该是我们有利的先天研究条件，在考虑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共同反应之下，或许不仅今日的环境既不比李博士的要来得优越，更要逊色于卢嘉锡的时候。由李·约瑟主持的整套图书计划有七大分卷共三十来册，至今尚有十来册未曾翻译为中文。每一本都是大部头，又涉及许多专业的知识，笔者目前也只计划阅读前两卷本。无论如何，做出判断之前应当先对要讨论的问题有尽可能全面的了解。以下是就对第一卷的阅读所得，算是有些粗浅的理性认识，不至落入空谈。

近代科学在西方的突破，是一个多因素、综合性的过程，其产生的原因的复杂多样的，是多种有利条件、先决要求同时的满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便无法因为东西古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差异，尤其是古希腊时代与先秦的中国的差异，即断然否定“科学”在中国古代的存在问题。对于没有西方影响下的（这个说法并不准确，下面还会提到）中国，能否独立发展出近代科学的体系，我们同样对此抱有相当的怀疑，但却不能说那些科学发展的众多前提要素，“前现代”的中国一项也不具备或者大多不具备。或许更恰当的描述，是中国具备了大多数的条件（比较重要的有：前现代时期充分发展的自然哲学观，从考据训诂中发展出的严密的逻辑方法，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），但在少数关键条件上卡了壳。这部分就是作者在本书提到但未展开分析的“在中国社会中起到过抑制科学发展作用的因素”。

另一点，正是在本册第七章“中国和欧洲之间科学思想与技术的传播情况”一章中，部分为我们揭示了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的有利条件，科学技术在古代社会不同地域文化间的交流传播，使得一些先为其他文化所发展的技术成为了一种“共同的基础”，对前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启发。这种积极作用实际上一直贯穿着人类文明的有记载以来的历史，如古埃及人、古苏美尔人的创造都曾为古希腊人所学习。同样的，如果以“中国文明未曾给现代文明做出任何贡献”这样的严苛标准来考虑，那么对现代文明唯一有贡献的只有狭义上的西方文明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即使假设是中国先于或独立地实现了近代科学的突破，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功劳要属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的人们。

上面提到的都算是“积极”的方面。无可怀疑的是，无论持有怎样的多元主义的观点，真正可算得上是“现代”的只有希腊-罗马-西欧相传至今的这一文化或者说这一人类文明的“子文明”，所谓“多元”大多仍是以西方视角为主元。虽然程度多少、细节几何还值得深入讨论，但现代中、西之异，既有文明体系的区分，也存在着“中古”与“近代”的差别。“近代的”关键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因素，依我们来看，正在科学上。要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，脱离不开如何应对、理解、吸收、发展科学进而涉及文化的其他领域。这都要求我们必须力求对中国科学及思想的历史有真实、全面的认识，做出持平之论，后才可有进一步的作为。